

活动的成就”，特别是她大篇幅引用了美国学者Galbraith对中共的社会和经济活动持肯定态度的文章，赞扬“中共颇有成效的经济体制”等，违反了反共法。现在回想起来，这本书虽难免会被批评为把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大跃进运动过于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书，但不管怎样，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不允许对中国进行任何正面谈论的严酷而黑暗的时期。同样，中国的情况也和韩国没有什么不同。被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称作“至暗时刻”^[5]的文革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因为持有外国书籍而遭到批判和处罚。从这一点看，中韩文学在结构上处于相同的状况。

这段时期的中韩两国文学从表面上看是非常不同的。1950年的朝鲜战争和中国的参战、1960年代的越南战争和韩国的参战，加剧了两国在东亚政治上的敌对关系，形成了“反共文学”和“反帝国主义文学”的对立关系。然而尽管存在这种表面上的对立，当时的两国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面貌却恰恰因此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在知识分子被实现民主化这一眼前目标压迫的情况下，韩国著名的批评家金炫也经历了一段不能明确表明自己文学立场的束缚，他在维新独裁政权崩溃后出版的《文学与乌托邦》一书中以这一段历史为铺垫，写下了以下内容：

我认为现在是时候来明确思考批评家真正应该做的是什么了。过去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把反体制作为目标，那时候思考“什么是文学批评”似乎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但现在呢？文学的非体制性超越了任何艺术，我曾经用“文学是梦想”来表述过这一点。(……)当文学只是实践的工具时，社会就失去了

梦想的空间，而失去了梦想就不可能发生社会改造。^[6]

1950年以后，韩国文学在反共意识形态和独裁政权下所经历的束缚和苦难，中国文学也同样经历过，其束缚和困难的强度更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发生的诸如大跃进、反右派斗争、胡风事件、文化大革命等的政治事件中，傅雷、丁玲、巴金、王蒙、金学铁等文人，冯友兰、陈寅恪、季羨林、吴晗等文学大师都遭受到了人类难以承受的各种压迫和迫害。傅雷等著名翻译家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和人类的尊严，选择了自杀。在堪称灵魂苦行之作——《随想录》中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自己时写道：“我相信过假话，甚至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他用“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以此来形容他当时为生存而表现出的窘迫。他说，回想起来，当时实在是可耻的“奴隶”相。

大学者冯友兰等人在经历了被揭露和批斗、警戒和敌对的满身疮痍的革命岁月后，将淡然地描述了这番苦难的经历：

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7]

按照知识分子的逻辑体系和良心来看，思想的改造是一种“转向”，必须伴随能够接受的必然理由。即使不能在情绪上产生共鸣，即使是谎言，只要能从逻辑上说明，知识分子就可以参与改造。但是，如果